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16.03.016

# 辛亥西昌张耀堂起义史实考论

卿 建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受四川保路运动影响,辛亥年西昌爆发了张耀堂起义。百余年来,此事件在相关文献中的记载存在诸多疑点。经考证,起义领导人张耀堂以字行<sup>①</sup>,名国政,为地方团练团首和秘密会社太阳会首领。章仪庆避讳改名章庆,在署理西昌知县前后的评价存在极大争议。通过初步分析起义原因,认为章庆之死有其个人原因,但更多的是时势的因素;章庆虽处事铁腕,镇压民众起义毫不手软,但对百姓生计颇为关心,横征暴敛的贪官形象当为革命党夸大的舆论宣传手段。

**关键词:**张耀堂起义;张耀堂;章庆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6)03-0059-04

## The Textual Research and Comments on Historical Facts of Zhang Yaotang Uprising in Xichang in 1911

QING Jia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Movement of Protecting Railways in Sichuan, the Zhang Yaotang Uprising broke out in 1911. There have been still many uncertainties in relevant documents concerning this event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fter research, Zhang Yaotang who was the leader of the uprising, also known as Zhang Guozheng, was both the head of local militia and a secret society called the Sun Society. As for Zhang Yiqing, he has changed his name to Zhang Qing to avoid a naming taboo, and the evaluation before and after his serving as the Acting Magistrate of Xichang County was still much controverted. After an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is uprising, the author of this thesis concludes that the cause of his death was his own side, but what's more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of that time. Although Zhang Qing's was always handling things with vigor and boldness, for instance, he suppressed the uprising of people mercilessly; he was indeed concerned with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is sense, his image of a corrupt official who constantly levies high and excessive taxes on his people should be an exaggerated one, which may be the results of the propaganda by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Key words:** Zhang Yaotang Uprising; Zhang Yaotang; Zhang Qing

辛亥之际,全国各地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四川民众为“破约保路”掀起了气壮山河的保路风潮和遍及全川的保路同志军武装斗争,宁远府首县西昌受此影响,于1911年10月26日(清宣统三年,农历辛亥年九月初五日)爆发了一场反清起义——辛亥张耀堂起义。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1911年7月,毕业于省城学堂的西昌籍同盟会员刘次平、王西平、朱用平(人称“三平”先生)奉命回籍宣传革命、保路反清,在组织西昌保路同志协会失败后,秘密联络同志,准备起事。“三平”在西昌的革命活动得到张耀堂的支持,经广泛联络,决定起义。因法籍

游历教士罗尚德、甘呢伯(亦译甘兰、甘拟柏)等人押运物资途经张耀堂辖境火烧梁时被其部属截获,冲突之下译员法属印度支那越南人阮文砚被杀,张耀堂于是决定在法国和清政府兴师问罪前起事。10月26日,义军里应外合,攻入西昌县城,斩杀署理西昌知县章庆。同城宁远府知府兼兵备道王典章(字幼农)、建昌镇巡防统领董南斌闻变以招安之计诱骗张耀堂带兵出城,义军退守城南泸山,王、董紧急调集兵团土练镇压,义军力战不敌,张耀堂逃回黄连坡(今黄联关)隐匿于山洞中,后被清军搜出凌迟处死,起义历经十余日宣告失败。

收稿日期:2016-05-14

作者简介:卿建(1993—),男,四川西昌人,历史学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历史学。

对于张耀堂起义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经过和影响,前人作过一些有益的研究,近年来亦零星见诸于报端。然而,从百余年来研究来看,此事件在有关文献中的记载存在诸多疑点,回忆性文章和口述史料存量可观但讹误较多,存在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陈垣先生曾经指出,“史源不清,浊流靡已”<sup>[1]</sup>,笔者拟对张耀堂起义的个中问题进行考证,厘清基本史实,并对起义原因作初步分析。

## 一、起义领导人张耀堂

起义领导人张耀堂之姓名,《辛亥殉难记·章知县传》《辛壬春秋·清臣殉难记第四十二》《清史稿·章庆传》称“张国怔”<sup>[2-4]</sup><sup>[3705]</sup>,《王幼农先生守宁远府城纪略》、民国《西昌县志》记为“张国政”<sup>[5-6]</sup><sup>[卷四]22</sup>,包括《张跃堂起义事略》《辛亥革命宁远纪事》在内的当代口述史料和论述多称“张国正”<sup>[7-8]</sup><sup>[356]</sup>。《辛亥殉难记·章知县传》《辛壬春秋·清臣殉难记第四十二》《清史稿·章庆传》史料系出同源,来源于北洋政府公报,民国四年(1915年)由兼代四川巡按使刘莹泽呈请,经大总统批令,交内务部褒扬章庆事迹并宣付清史馆立传<sup>[9]</sup><sup>[第58册]472-473,639-641</sup>。“怔”,《康熙字典》解释为“惶遽也”<sup>[10]</sup>,意为惊恐慌张,不应用于人名,若非讹误,即为刘莹泽视张耀堂为匪寇的蓄意之举。目前依然缺乏能够直接证明张耀堂姓名的档案史料,但综合比较记载其姓名的三种文献,《西昌县志》等所记“国政”之名从时间上、文献性质上更为可信。

张国政,字耀堂,以字行,而诸家著作中“耀堂”、“跃堂”之字混淆不清,直接影响了辛亥西昌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准确命名。资料显示,“跃堂”记载最早出现于1980年代的口述史料(《张跃堂起义事略》),而“耀堂”之字从民初通用至今,为蜀军政府文告、北洋政府公报、《西昌县志》等采用。民国元年(1912年)3月18日蜀军政府发文《蜀军政府公布四川死义烈士》,将张氏列入烈士名单之中:“张耀堂,西昌人。率兵攻县署,为伪宁远府王典章击死”<sup>[11]</sup>,就这一记载而言,一则公告发布时间距此事很近,又属于政府公告,应有当时亲历起义的革命党人推送材料,字“耀堂”的记载应当是准确的。笔者在实地考察中曾发现张母谢氏坟莹,墓主身份确定无疑,其后人于1997年所立墓志中记国政为“耀堂”<sup>[2]</sup>,可进一步佐证张氏字“耀堂”。笔者推测,“耀堂”与“跃堂”为文字音韵之误:“跃”字简化前作“躍”,在汉字结构上与“耀”形同;官话方言中不少人将“跃”发音为“yào”,西昌本地方言、客家话、广韵

“跃”字皆读“yào”音,因此,极有可能因汉字结构和发音而致文字表达错误。

张耀堂生年无考,但从张母谢氏墓志便可推算张耀堂生年,碑载谢氏“二十四岁时高祖父<sup>③</sup>逝世,长子张耀堂时仅十二岁”,但墓志所记张母“光绪十八年生人”(1892年)、“卒年三十”、“光绪四十八年逝”(光绪年号仅通行34年)之语实则荒谬,按此说,张耀堂生于1904年,不符。以张耀堂族弟张国钧生于同治七年(1868年)计,张耀堂最晚也应生于1868年,清代皇帝道咸同光四个年号仅道光、光绪使用时间超过18年,若“光绪十八年”为“道光十八年”(1838年)之误,则张耀堂生年为1850年(道光三十年),领导起义时已年届花甲。结合张耀堂办团二十余年的经历来看,生于1850年的推算不无道理。

另须指出,张耀堂祖籍广东兴宁,本为客家<sup>[12]</sup><sup>[415-417]</sup>,只因领导了有彝族义军合作参与的起义,便产生了张耀堂是彝族领袖的讹误。

关于张耀堂在起义前的身份,现有研究也颇为混乱。《西康省通志》载,张耀堂“以武生主办团务,公正果决,令出必行,而强毅善战。常袭击倮匪,无不以寡胜众,威震凉山,倮人悚服”<sup>[13]</sup>,研究者多认为张耀堂担任西昌地方团练第十三团总团,办理黄连坡、大小中坝、黄水塘一带团务,亦有称其为民团副职者<sup>[8]</sup><sup>[356]</sup>。北洋政府公报称其为“已革保正”,保正职权与总团相当,清末大兴团练,保甲废弛,《西昌县志》于清末民初团务条有详尽介绍<sup>[6]</sup><sup>[卷八]14-15</sup>,由此观之,张耀堂当为颇具声望的地方团练团首,握有一定规模的地方武装。时值张耀堂因故触怒章庆,被革去团首之职,但他凭借个人威望,团务事无巨细仍由自己做主。

张耀堂另一身份便是北洋政府公报和《清史稿》所称之“哥匪”——秘密会社首领。张耀堂征剿周边彝族家支战功颇多,并以其黑白两道的身份获得了颇高的威望,与彝族上层人士联系紧密,在后来的起义中,汉、彝、回各族民众共同上演了轰轰烈烈的反清起义。然而就其秘密会社首领的身份也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记载,问题的核心是“太阳会”:《辛亥革命宁远纪事》一文称张为“黄连坡哥老会‘太阳会’首领”,“他的‘太阳会’有会众数千”,“秘密商定在(农历)冬月十九‘太阳会’大集会时起义”<sup>[8]</sup><sup>[356]</sup>;《从两通碑刻看辛亥革命在凉山彝区的影响》一文考证称张耀堂“原计划在冬月十九太阳会起义”<sup>[14]</sup>;《辛亥张耀堂西昌起义与失败》一文写道“三平”与张耀堂“共同研究决定十一月九日‘太阳会’这天起义”<sup>[15]</sup>。上述三则材料明显存在两处不同,一为“太

阳会”具体所指,二是原定起义时间。经证实,农历十一月(冬月)十九日,西昌道观庙宇确有庙会太阳会,则“太阳会”为宗教庙会无疑,原定起义时间也应是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北洋政府沿袭前清官方认定张耀堂传习太阳教,将之定性为“邪教”,“惑众敛财”<sup>[19](第58册)640</sup>;结合社区调查资料,其时太阳会确实存在,会众多为黄连坡一带客家农民,张耀堂为该会首领<sup>[12][415-417]</sup>。据此可以断定,革命党、张耀堂原计划以张之团练武装和太阳会会众为主力,于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太阳会庙会起义。

张耀堂无论是地方团首还是秘密社会首领,终因其辛亥年践行“推翻满清,废除新政,杀贪官,灭洋人”<sup>[16]</sup>的义举,成为革命烈士。蜀军政府将张耀堂与邹容、喻培伦等赫然并列入50位烈士名单之中,足见张耀堂在当时具有毋庸置疑的起义领导地位。

## 二、署理西昌知县章庆

章庆,宣统三年署理西昌知县,对于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府县压制甚烈,都人士持论激烈者,章令深忌之”,10月26日,义军“以捆送夷匪为名,率众入城,轰入县署,杀章令,取其头”<sup>[6](卷九)3</sup>。几乎所有当代辛亥革命研究文献从革命史角度,将章庆在起义中的角色明显地列为清政府弊政的代表——被革命者,而且是被针对的最主要的被革命者。多篇研究文章认为“当时,西昌地方政府极端腐败,知县章庆借推行‘新政’之名,横征暴敛,鱼肉乡民”,在革命党人筹办的《帝国日报》(1909年创办,宁调元等任主编)、《民立报》(1910年创办,宋教仁等任主编)中负面报道尤多,《民立报》称自章庆“莅任以来,视民如仇,暴厉剥削,滥罚勒捐,三月累万”<sup>[17]39</sup>,章庆的形象完全是一个残暴的清朝官吏,甚至被当地人冠以“章刷狗”之恶名,县志也记载了章庆“奉命开办茶铺捐,操之过急,酿成闭市”<sup>[6](卷九)2</sup>之事。

然而在张耀堂起义研究文章之外的文献,章庆却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员。《清史稿》以206字简要介绍了章庆生平,载其字勤生,浙江会稽人,游蜀就幕职,为总督锡良等所器重,历署剑州、南部、冕宁、西昌,政绩斐然,保路运动爆发后,因哥老会袭城被杀身亡,故列其入《忠义传》<sup>[4]13704-13705</sup>。据考,章庆原名章仪庆,号寄盒,以“章仪庆”为“章庆”,当为宣统帝溥仪即位后章庆为尊者讳,主动改名之举。“避讳改名之例有三:一改其名,二称其字,三去其名一字”<sup>[18]</sup>,章庆改名属于第三种。有学者在对清代南部县衙档案进行整理时发现,章庆“以监生报捐出仕、曾剿办资州拳匪、解饷京师”,在“剑州任上镇压南

部何如道起义、振兴学务、在南部县抗洪赈灾、查拿奸伪”<sup>[19]</sup>;甚至有研究者认为章庆是一个在任期间重视教育,积极兴办半日学堂,朴实低调,“才识宏通、尽心民事”的知县<sup>[20]</sup>。从北洋政府公报、《辛壬春秋》、《辛亥殉难记》亦可发现章庆确曾有过劝课农桑、开矿办厂、兴修水利、兴办学堂的文治,也有剿办“资州拳匪”、镇压南部何如道起义、收降普支夷的“武功”。这些史料是对张耀堂起义研究的有益补充,对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人物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上述两个方面的描述,不难发现章庆在署理西昌知县前后呈现出两张截然不同的脸谱,不同时期、不同人物对章庆生前身后的评价存在极大的争议,到底为何褒扬又为何贬抑?褒扬者可分为三类,清末重臣高官、民初官员文人和现今学者。锡良等清末重臣高官乃章庆上级,看重章庆的能力和政绩,故褒扬任用;刘莹泽、尚秉和等民初官员文人知晓章庆政绩,对其作为前清官吏因有守土之责殉清而亡颇感惋惜,当然,其中也不乏罔顾革命大势的守旧势力;而现今学者是对局部史料的客观解读和在此基础上的个人发挥,研究范围局限于某一方面或领域。贬抑者亦可分为三类,革命党、当时的西昌百姓和建国以来的辛亥革命研究者。革命党从反清舆论斗争的需要出发,着重宣传报道章庆负面消息并加以夸大;因章庆到任西昌时间颇短、不为人知,加之经过革命党的反清启蒙,西昌百姓对章庆的施政举措多有不满;建国以来的辛亥革命研究者多数掌握史料不全,在从革命史角度解读历史的过程中重事件、轻人物,对章庆贬抑之声尤烈。

章庆作为张耀堂起义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对他的评价决不能偏信一家之言,章庆确有政绩不假,又当如何看待章庆“横征暴敛”而致张耀堂起义爆发的观点?笔者现就起义爆发原因进行初步分析,以对章庆作出较为全面客观公允的评价。

## 三、起义原因辨析

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保路运动爆发后,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西昌籍同盟会员纷纷返乡组织革命,定期在西昌城内文昌宫集会演说,并至县内各地进行革命宣传,组织罢市、罢课,开展抗捐、抗税、抗粮和反洋教斗争。革命党人的宣传动员工作提高了城乡民众的反清意识,极大地激发了各族民众反清反帝的爱国热情,为起义做好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准备。

起义前夕,西昌社会矛盾尖锐,集中体现在民众与官府的矛盾、彝族上层与官府的矛盾、各族民众与洋教的矛盾,革命一触即发,此乃原因之二。在晚清官府统治下,西昌社会底层民众饱受各种捐税剥削,“马草抽捐,贫民刈草一背,只售钱二三十文,亦按十抽五”<sup>[17]39</sup>,此语虽出自《帝国日报》,但捐税之烈可见一斑。章庆在奉命开办茶捐时因剥削过重、方法欠妥,引发罢市,以致被认定为“横征暴敛”。晚清中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的统治力量有所削弱,宁远彝族的反清反帝斗争此起彼伏,据《西昌县志·平夷纪实》记载,同光年间西昌发生大规模彝族反抗斗争五次,均被清政府调兵镇压,小规模骚乱更是不计其数<sup>[6](卷八)13-16</sup>。光宣之际,清政府筹划治边固川保藏大计,1908年赵尔巽接任四川总督,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策略恢复到积极的进取时期,官府与少数民族上层基本处于压制与反抗不断的状态。洋人以教会传教和科学考察作为掩护,在宁远地区长期从事非法活动,激起民众反感,“帝国主义者还与清地方官府勾结,包揽词讼,强夺民财、奸淫妇女、霸占田产,并唆使黑彝奴隶主进行冤家械斗,挑起民族仇杀”<sup>[17]39</sup>,以致教案频发。

太阳会对清政府统治秩序有对抗的情绪和实力,造成了革命党与太阳会联手反清的局面。“秘密会社长期在社会上处于受歧视、压迫、打击的地位,因此在政治思想上通常对现实统治秩序有对抗的情绪。”<sup>[21](绪论)4</sup>与此相对,清政府同样把太阳会视作“惑众敛财”的“邪教”加以压制。民主革命初期,革命党人力量尚弱,西昌偏居西南,同盟会发展程度更是薄弱,因此,革命党人联合太阳会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需要指出的是,“秘密会社成员的分散、经济地位的落后、文化水平的蒙昧闭塞,极大限制了他们的政治眼光”<sup>[21](绪论)4-5</sup>,这也是后来革命党人和张耀堂合作领导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章庆署理西昌知县时,正值保路同志军起义爆发,四川总督赵尔丰密调宁远军队出防,驻防西昌的建昌镇巡防军后五营和宁远府新招防军练军各一营调往成都镇压同志军,其时大相岭阻击战战事正烈,西昌城中兵力不足,防务空虚。革命党和张耀堂侦知清军北调这一情报,把握机会,趁机起事,此乃原因之四。

据已有研究资料,章庆尚用武力,为官之道以铁腕果决著称,任官所到之处均有政绩,颇得锡良、沈秉堃、冯煦、凤全、赵藩等高官赏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章庆被委任为剑州知州,《清史稿》称

其“擒巨逆王文朗,歼其党九十余人”<sup>[4]13705</sup>,锡良在《剿办南部邪匪并奖励官弁折》中请将章庆、黄鼎“先予各加军功随带三级”<sup>[22]</sup>。南部县何如道起义爆发后,锡良将原南部知县宝震撤职,并将章庆调署南部专办此案。在南部任上的一年中,缉拿、审判何如道案案犯是章庆主要经手之事。调署西昌知县仅月余,章庆与民风剽悍的西昌民众迅速进入势同水火的状态,激化了矛盾,这与他的为官之道和个人性格息息相关。

与章庆个人原因相对,便是张耀堂对现实的反感以及张、章二人的个人恩怨。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张耀堂对西昌官府多有不满。加之“章令刚愎自用,以小故取消张耀堂团职”<sup>[6](卷九)3</sup>,而此“小故”则是张耀堂部属因赌博发生械斗伤人致死,张代凶手到章庆处求情送礼,因此触怒章庆,遭到免职,此即“袖金谋讼”。对此张耀堂难免心生怨恨,而这被革命党人加以利用,激化了二人矛盾。章庆崇尚刑名之学,处置方法本是合理合法,结合南部县衙档案,可知章庆“早已自矢清勤”,“拿办决不徇情”<sup>[23]</sup>。

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阮文砚教案。前述法籍游历教士罗尚德、甘呢伯随从译员阮文砚被杀死一事,当地人称为“砍洋驮子”事件,张耀堂自知难逃干系,于是与裁缺<sup>④</sup>千总黄义库决定在法国和清政府兴师问罪前起事。阮文砚教案的发生激化了民众与官府、洋人的矛盾,使张耀堂起义的步伐加速。教案发生后,张耀堂必须迅速做出选择,要么束手就擒,要么揭竿而起、提前举事,显然张耀堂选择了后者。后经法国交涉,民国二年(1913年),教案由四川政府议结,定张耀堂为外交案重犯。

#### 四、结语

综合上述七大原因分析,张耀堂起义的发生是历史必然与偶然相结合的产物,章庆调署西昌知县仅月余便在武装起义中身首异处,有其个人原因,但更多的是时势的因素。从章庆从政经历来看,他虽处事铁腕,镇压民众起义毫不手软,但对百姓生计颇为关心,横征暴敛的贪官形象当为革命党夸大了的舆论宣传手段。当然,对章庆作出的正面评价并不能掩盖他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逆反作用。时人对章庆评价的差异是立场不同的反映,今人在历史研究中应当全面客观因时因地综合分析史料、解读史料,并加以甄别,做到论从史出,坚持用一分为二原则和时代性原则进行人物评价。(下转第81页)

信息化管理平台。管理平台一方面要对被监护的老年人进行信息采集、登记注册,完善档案,真正在信息交流、调剂余缺、平衡供需等方面实现统一管理,另一方面该平台同时也便于家属或民众对监护服务进行有效监督和意见反馈,从而促进社区老年监护工作的完善<sup>[4]</sup>。

## 五、结语

随着老龄化社会进程的不断加快,社区这种以

一定地域为基础,以共同情感、价值、利益、行为为特征的共同体必将在老年监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社区的积极介入与参与,不仅能够起到衔接国家与社会的作用,而且也符合我国的“孝道”文化,更多的老年人愿意接受“养老不离家”,社区监护恰恰能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诚然,老年监护是个系统工程,在突出社区监护作用的同时,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加大力度扶持,才能让社区老年监护走得更远。

### 参考文献:

- [1] 张伟,陶文静.老年社会工作在城市社区养老中的作用分析[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12):62.
- [2] 孙唐水.社会工作在老年照料与服务中的作用[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7):14.
- [3] 刘香玲.社区组织建设中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11):37.
- [4] 黄少宽.国外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特点[J].城市问题,2013(8):87.

(责任编辑:王明雯)

(上接第62页)

### 注释:

- ① “以字行”是“以字行于世”的意思,指人们多仅称呼此人的“字”,而不呼其“名”,是一个流行于汉字文化圈中关于称谓的术语。
- ② “耀”字收录在1977年《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曾作为“耀”的简化字流行一时,现已停用。
- ③ 碑载“高祖父”即谢氏夫君、张耀堂之父。
- ④ “裁缺”是清代官制“官缺”制度的一种形式,指官吏免去原任官职,等候补缺。

### 参考文献:

- [1]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0:181.
- [2] 吴自修.辛亥殉难记[C]//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5:73.
- [3] 尚秉和.辛壬春秋[M].北京:辛壬历史编辑社,民国十三年(1924年)刻本:29.
- [4]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5] 陈澹然.王幼农先生守宁远府城纪略[M].民国十四年(1925年)刻本:1.
- [6] 郑少成,杨肇基,等.西昌县志[M].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铅印本.
- [7] 付仲光.张跃堂起义事略[C]//政协西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西昌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86:73.
- [8] 程汉字.辛亥革命宁远纪事[C]//政协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1992.
- [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政府公报[R].上海:上海书店,1988.
- [10] 陈廷敬,张玉书等.康熙字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324.
- [11] 蜀军政府.蜀军政府公布四川死义烈士[C]//政协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79:142.
- [12] 陈世松,刘义章.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 [13]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34.
- [14] 张正宁.从三通碑刻看辛亥革命在凉山彝区的影响[J].四川文物,1991(4):72.
- [15] 高履龙.辛亥张耀堂西昌起义与失败[J].四川文物,1995(2):59.
- [16] 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13.
- [17] 周锡银,钱安靖.辛亥张耀堂领导的凉山彝汉人民反清起义[J].思想战线,1981(5).
- [18] 陈垣.史讳举例[M].北京:中华书局,2012:19.
- [19] 黎春林,金生杨.《清史稿·章庆传》史实补考——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24.
- [20] 胡剑.一位重教兴学的清代知县[J].中国档案,2012(4):78.
- [21] 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22] 锡良.锡良遗稿奏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9:609.
- [23] 胡剑.清代两位县太爷的“青天情结”[N].中国档案报,2015-02-06(4).

(责任编辑:董应龙)